

舒国治：城市的晃游者

“我躺下来，以一张报纸做枕头。高高在我上方的，是眨眼的星星，而当火车弯曲而行，这些星群便像在上上下下地画着弧形，望着它们，我睡着了。这天过去了——我生命中所有天里的一天。明天又会是另外一天，而我依然年轻。”1983年，也许是受到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小说《大路》里的这句话的鼓舞，一个叫舒国治的台湾青年背起行囊，走上了长达7年的浪迹美国之旅。

□本报记者 钟华

而如今，在北京常常能看到年轻的上班族捧着已成为台湾最有名气的旅行文学作家舒国治的《流浪集》在拥挤的地铁里阅读。他们，有一天也会挣脱藩篱，向流浪的路上走去吗？

尽管之前已经看到过舒国治的照片，当记者在北京今日美术馆见到他时，还是有些惊异，一身体闲打扮的他，瘦瘦高高，清瘦却显得十分有活力，坐椅旁边放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这样的背包，早已成为这个城市晃游者最为典型的标志了。

关于流浪

著名作家朱天文说：“如果只读一本舒国治，就是这本《流浪集》。”大约是因为这部《流浪集》将“流浪文学”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尤其是书后题词一篇《流浪的艺术》，将“流浪”上升为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独特而让人艳羡的态度。“当你什么工作皆不想做，或人生每一桩事皆有极大的不情愿，在这时刻，你毋宁去流浪。去千山万水的跋涉度日，耗空你的身心，粗砺你的知觉，直到你能自发地甘愿地回抵原先的枯燥岗位做你身前的事。”流浪，成为了困于都市的人们向往之的事情。

1983年，舒国治的小说《村人遇难记》赢得台湾文坛瞩目，一片大好前程正在眼前的时候，他毅然

放弃这一切，流浪美国。7年里，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每到一处打点零工，攒点小钱，然后再上路。

从美国回到台湾后，没有职业，至今租房。在台北一个没有冷气和电视的房子里，他怡然自得地一边和朋友在高档餐厅喝昂贵的葡萄酒，一边过着被大多都市人认为“赤贫”的日子。

有人将舒国治奉为掀起都市流浪运动的革命者，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我从来没有办法在真正的生活上做什么革命。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也没有什么投机的行业，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能使自己赚钱安身立命的。我觉得



《流浪集》，舒国治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定价：26.00元

如果20岁出头的时候，找一份工作，贷款买一套房子，把每个月的钱省下来付贷款。那么你们的年轻岁月，那种懵懵懂懂，像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那种轻浮岁月就完全丢失了。”

而那个时候，他发现很多外国人喜欢到处玩，露营，到海滩边上晒太阳。被这种生活方式所吸引的他，也想试试过这样的生活。他将自己归为“时代的产物”：“上世纪80年代会让有些人觉得，省一点，就可以自己不用去特别忙地赚钱，还能过，还可以晚一点再去顾虑怎么去赚钱收。”

谈到《流浪集》，他说：“用流浪这个词来说明我那段生活状态，然后把我知道的一些流浪的状态写出来，集成这个集子。”那么，如今的年轻人，是否能把《流浪集》当成他们的流浪指导手册呢？舒国治说：“假如也想像我这样，可能他们有些难度。可能很多人会要先去追逐财富，然后才去享受。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诱惑会有很多，看你选哪一个。”

关于文字

“能够走路，是世上最美之事。何处皆能去得，何样景致皆能明晰见得。当心中有些微烦恼，腹中有少许不化，放步走走，十分钟，二十分钟，便渐有些抛去。若再往下而走，愈走愈到了另一境地，始终不唯心中烦恼已除，甚至连美景——奔来眼宿。”这是舒国治在谈走路。

而关于看似平常的喝茶、睡觉，乃至烧饼豆浆，他亦能谈出雅趣来。读者喜欢他的书，除了艳羡向往这种生活状态，对他文字的喜爱，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他对文字的驾驭来源于早年受道过的很规范的古典文化教育，“很优质的文字熏陶，就像音乐的熏陶，人格的熏陶一样，类似太极拳的这种老拳家，随着岁月的增长，增加对宇宙和人生的体悟。”

怎么恰如其分地运用中文？怎么讲事情让读者更容易接受？“我只是想怎么把它讲得让人读着轻松，很舒服。有的人是要读着拜服于他的学问，有的人是要拜服于他的风趣，我都不全然是要这样，我只是想讲我的人生体会，像看风景和游玩一样。社会、世道要当风景来看，玩，你在这里停留，在这里耗用着时间，在这边里发掘趣味，这些都是玩。”舒国治说。

从20多岁开始流浪，人生不同阶段累积出的痕迹表现在文字中，而愈发老道醇厚。他说：“我写的很多都是我20多岁就有兴趣但现在并没因年龄的增长而不能再写的东西。我不是要写年轻体的东西，有些题材年轻人未必能写，比如写睡觉，年轻人可能很同意，但是可能我想，就是要老一些才能写出这些思考来。”

关于家

50多岁的舒国治常常自嘲说，老了，已经不太走得动了。他现在将



生活的大多数时间放在了台北。

但即使在台北，他也常常在行走中。每天，到中午时间，舒国治会出门在外吃午饭。而一个礼拜中必须要干活的两个下午，他就会在饭后回家大概两个小时写作，然后在趁着黄昏以前再出去外头晃晃。这时，正好外边也不再炎热，还能够看到落日的那种金黄色。

而那些不需要干活的下午，他午饭吃完后会在附近几个店家串门，喝两杯茶，讲讲话，再回家工作。多年来的流浪生活，使饭馆成为了他的厨房，而他做饭的定义则是一贯的舒式幽默：“总会有很多不靠谱的菜搭配几个靠谱的菜成为一个饭馆。”

晚饭他常常要接待客人，或者是很多很熟的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大家常常对生老病死的事情探讨得最熟练，谁讲身体不好，那应该找哪个大夫，去哪里检查身体，如何进行身体锻炼……

而对于家的认识，舒国治则是一种朴素的回归，他认为家就是用来睡觉，墙面书架用来摆书，仅此而已。“我只在家里做这最重要的几件事情。我最讨厌家里的沙发、茶几、电视，这样一个宗族的格局。家本来应该是开阔而自然，孩子在家里打滚，父母在家里跳舞，爷爷打太极拳，家里本来应该是这样的。”舒国治说，“我能看到这些本质，是因为我天天在大自然中。”

□龙九尊

当《张枣的诗》摆在颜炼军面前时，已经逝去的诗人终于以另一种生命在他心里复活了。年初以来，作为《张枣的诗》的编者、诗人张枣的学生，他觉得张枣只是暂时远行德国还未归来。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 梅花便落了下来”——张枣少时名作《镜中》的诗句在诗人离世之后成为无数人的MSN签名，狂热的飘逸的时光倒流到了那个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人们一遍遍传颂着若干年前诗人给自己谱写的挽歌。

现在，在地铁或是公共汽车上，颜炼军常常忍不住掏出这本薄薄的诗集，与纸上驻留的生命对话，诗人之甜在周围袅袅弥漫，激荡起曾经的诗缘人缘。他相信，这也许就是张枣不会在他梦里出现的原因，因为他一直存在——他的诗延续着生命的

我们的心要这样向世界打开

呼吸。

《张枣的诗》出版不到一个月，5000册便脱销，他不时接到朋友们向他要诗集的电话。这本诗集惹人喜爱，让他倍感欣慰。在他看来，人们悄声谈论张枣，传递着诗歌的气息，能给我们的灵魂以绵绵不绝的慰藉。在广大诗歌爱好者的支持下，《张枣的诗》及时得到了修订。近日，颜炼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科学时报》：张枣去世之后，很多人都在寻找他的诗集，是什么促使你组织编辑《张枣的诗》？

颜炼军：张枣的许多重要作品，包括若干重要的诗歌译作，在他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诗集《春秋来信》中得到了集中展示。在广大诗歌爱好者的支持下，《春秋来信》只收入了张枣的部分作品。实际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张枣，还有几十首诗作散落在各种民刊和海外汉刊刊物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作品越来越被读者看到。另外，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张枣的许多作品，也由于他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以及其他原因，尚没有在国内正式出版过。

张枣猝然去世，诗歌界和广大诗歌爱好者扼腕不已，惋惜他的英年早逝。在这个消费统领一切，房价成为社会焦点的年代，一位真正具有广泛影响的纯粹的抒情诗人的病逝，被许多媒体赋予了象征意义。文化界对张枣病逝关注的广度和深度，让人有些惊讶。在这个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比较完整的张枣诗集，总结和肯定他对于当代汉语诗歌的贡献，也就成为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一方面，是因为张枣对当代汉语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得到公认；另一方面，中国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对人们内心的磨砺和刺激，也需要各种精神元素来修复。一本优秀的诗歌出版物，也许能默默地修复一些世道人心中被

磨损，却不可或缺的东西。

《科学时报》：搜集的过程困难吗？你通过哪些渠道找到他的诗的？此外，这本诗集是否收录了张枣全部的诗歌作品？

颜炼军：《春秋来信》是我们搜集和增添的基础，其中有张枣的诗63首。诗人陈东东、柏桦和宋琳尽心翻找了手头的各种资料、刊物和信件，给我提供了一个没有收入《春秋来信》的集外集。先后提供了包括《父亲》、《大地之歌》在内的五十多首作品。

据诗人柏桦提供的线索，20世纪80年代初张枣有一本油印诗集叫《四月诗选》，其中收入的一组张枣的诗，后来大都没有收入《春秋来信》中。柏桦发信、电话向许多人寻觅一本《四月诗选》，终究苦寻而不得。正在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宋琳在张枣北京的书房里找到了《四月诗选》，其中有他早年

的作品10首，似乎张枣对本诗集很珍视，他后来离开重庆到德国20多年了，后来又迁往过许多地方，能把这本诗集一直保留在身边，最后放到北京的书房里，是奇迹，也是天意。

我也两次联系张枣的夫人李凡女士，请求她在丧夫之痛中帮我们留意诗稿。5月下旬，李凡女士带着张枣的骨灰和两个儿子回国，她把张枣在德国病中写的手稿郑重交给宋琳。

6月又收到张枣远在长沙的父亲张式德老先生手保存的张枣诗稿的复印件，是张枣在湖南师范大学上学期间的8首诗。其中包括两首旧体诗词。这些也许是张枣不愿意公之于世的作品，悔少时作，是优秀写作者特有的情结。我与柏桦和宋琳二先生商定，出于编者的职责，我们有义务将一位已故诗人留下的作品完整地展示给读者。当然，有些作品可能有别的版本，但有些尚看不到。如果将来有必要、有机会，再对诗集作补充和修订。这就需要广大诗读者，尤其是张枣的朋友的留意和捐助。

《科学时报》：目前读者对这本诗集的反响如何？人们怎么评价张枣的诗？张枣生前怎么看自己的作品？

颜炼军：非常不错。作为诗集来说，刚上市一个月5000册就卖掉了，现在又加印3000册，趁机修订了一些瑕疵和疏漏。目前国内对张枣诗歌的评价有些一致性，当然也有很多盲点。许多人认为张枣把汉语的感性写到了极致，认为他对古典、西方诗歌在现代汉语中的重新发明做得很好。张枣曾和我说过，他最满意的作品是《云》组诗，觉得这首诗歌解决了最尖端的诗学问题。总的来说，张枣惜墨如金，一句顶一万句，写得少，但几乎没有败笔。

张枣(1962—2010)，湖南长沙人，先后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1985年赴德国留学，后长期寓居西方，获德国特里尔大学文哲博士，曾任教于德国图宾根大学，为欧盟艺术基金会评委和“当代中国学”通讯教授。21世纪初回国，曾在河南大学任教，后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2010年因肺癌去世。出版有诗集《春秋来信》、《中国现代性研究》(德文)，主编有《德汉双语词典》、《黄珂》等书。另有英语、德语诗歌和童话译作若干。出版译作有《史蒂文斯诗文集》(与陈东晓合译)、《月之花》、《暗夜》。



《张枣的诗》，张枣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定价：20.00元

□张胜友

以文学的方式“抚摸岁月”，乃人生一大乐趣。

一部近70万字的鸿篇巨制，出自一位客家妹子之手，抚摸往昔的岁月，追思伟大的母亲，品味幸福的人生，浓缩两代人的命运及一个家庭曲折动人的故事，所映证的是与时代同行，折射出乐观进取的境界与品格。

何英并非一位职业作家，繁忙公务之余，秉持对文学的挚爱及感恩于生活，潜心读书、写作，终于为社会为读者奉献了一部厚实的颇具生活质感的长篇纪实文学《抚摸岁月》。

独特的视角。同样是爱情、婚姻与家庭这个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的演绎，作品从农村姑娘内世界的细腻观察，以及从一个底层的纯朴的农村姑娘，到国家干部成熟的评判力，全方位的描述，我们不由得受到两代主人公的曲折人生的震撼：一个传统的、善良的、受尽磨难的母亲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生活理念；一个山村姑娘对真挚美好的挚爱，对新生活的渴望，以及追逐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勇气，可以说，生命的意义得到了升华和释放。特别是从中又被强地感受到作者刚正的性格，疾恶

扬善，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同时我们又欣慰地看到作者风雨兼程的人生搏击终成正果，艰苦奋斗赢得的春华秋实。

作品脉络清晰。亲、情、义，两代人，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到城市。在娓娓道来的篇章中徐徐呈现。不管我们来自城市或者农村，不论我们是作者的长辈、同一代人，抑或是“80后”、“90后”，书中描摹的恢弘画卷，鲜活的人物，细腻的场景民俗，丰富的人情世态，都让人耳目一新。

作品文笔流畅，平实无华。虽然是第一次创作长篇小说，但笔法娴熟，这基于她深厚的生活积累和长期撰写不舍的历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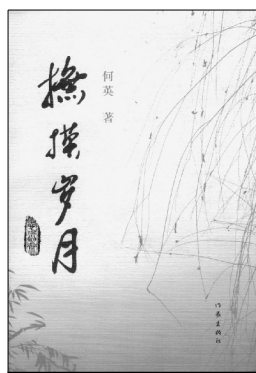
比如讲到幼年的逃难母亲：“母亲就随着一大群往‘客顶’走的队伍，日夜兼程地往前走，迈着沉重的脚步，在这支庞大的、缓缓挪动的队伍中，有年长的，有年中的，有年轻的，有年少的，也有年幼不会走而被人用箩筐挑着的，路上，不时会看到，逃难队伍中的实在是走不动的人坐在那里，这是

忆往昔岁月稠

排队的人，有的就再也没能站起来了。她属于能走几步、之后又有人用箩筐挑着的。不知过了多久，这支队伍人数在明显地减少。实际上是有的被卖给了别人，有的被人收留了。当然，有不少是在那挪动的路上失踪甚至失去了生命的人。又不知过了多少天，母亲也被一户人家收下了。这时有用人家乡的潮州话告诉她：“你留在这里，有‘呷梅’（吃稀饭）。实际上是自己被别人给卖了……”这就是母亲苦难的开端。

比如讲到开圩场：“以前常听老人们传说关于‘开圩场’的习俗。说的是开圩日之前，由长者择一吉日，出门前必须焚香沐浴，周边最为热闹的圩场，悄悄地从人群中最为集中的中央抬起一粒‘卵石’揣入怀中，带回本地。又于选择好的本地‘开圩日’的‘吉时’，再悄悄地将这粒‘卵石’放在街中人群最集中的地方。特别要注意的是，这时一定要悄悄地，不被任何人知道。否则，这个‘圩场’就会开不成功。”一幅栩栩如生的乡村风俗画卷。

比如讲到回家：“好不容易我被挤上了火车，站在车厢门边人手拥挤，不好下车。行李多，靠在车厢的门站着，半闭着眼睛，姑且权作休息。火车启动后，我一直原地站着，动弹不得。当



《抚摸岁月》，何英著，作家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定价：98.00元

你在所有的空间盛开

爱情，在婚姻的门槛边上，男人都想做“逃兵”的时候。高兹起初选择了犹豫和逃避，在内心深处，他拒绝承担婚姻现实的那一面。很多年以后，他才意识到，D一直在努力承担他逃避的那一部分，她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打算过一生，你们就将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损于你们结合的事情。建构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你们共同的计划，你们永远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加强、改变，调整方向。你门怎么做，就成为怎样的人。”这几乎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而身为萨特哲学的追随者，高兹对此无法抗拒。在对待婚姻上，高兹被多莉娜的“存在主义”折磨，乖乖地与多莉娜共建围城，而终生以实践拒绝婚姻的萨特截然相对，实在是一件很有喜感的事情。

曾经，高兹像很多自以为是的男人那样，认为在与爱人的关系中，自己处于“强势”，无论是在知识上，还是在生存环境上(D是英国人，身处异国)，都占据优势，D是可怜的小东西，没有他就完了。在最后的反思与告白中，高兹不无忏悔地承认，D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有自己的追求者，自己的钱比他多，有自己的见解，游刃有余地充当他的“秘书”，为他整理、收集资料，是他不可或缺的工作伙伴。最

重要的是，D天生具有生活的“常识”，拥有直面现实的智慧，能够从容地与这个世界、与他人和谐相处，在她身上，不存在现实与精神世界的分裂。她以本色示人，生活困苦给了她翅膀，然而高兹恰恰缺乏这样的能力，她是一辈子生活在哲学概念世界的人，试图通过写作，通过作品出版寻得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的一席之地，很难将自己的文字和现实对应起来，困苦只能让他陷入消沉。他发现，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需要经过夫妻关系的张弛网，才能达成和谐。D为他提供了现实世界的“避处”。真正强大的是D，是他离不开她。他不无佩服地写道：“我觉得我并不曾真正地生活过，我总是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我的生命，只拓展了自己某一个侧面，作为个人，我是贫瘠的。而你一直以来都比我富有，你在所有的空间里盛开。你与你的生活处于同一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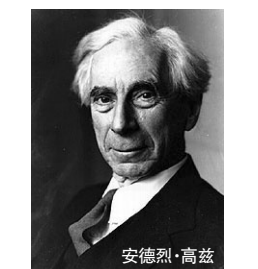
在高兹写这本《致D》时，D已经罹患癌症多年，缠绵病榻，去日无多。高兹写作此信的初衷，是为了抓住爱情之于他们的真正意义，与其说是写给D，不如说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作为一个思想者，他缺乏现实生活的智慧，却拥有发达的反思能力，拥有探寻本质的智慧，他对自己爱情婚姻经验的思考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并且越来越

坚定和清晰。他曾经试图在《叛徒》中用哲学来解释爱情，在追溯与反思自己和D的情感婚姻经验时，他发现哲学不是答案，爱情在哲学之外。在《致D》中，他终于说出了一直以来想要对D说的话：“正是我们的爱情故事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这个模样，经彼此而生，为彼此而生。”也许，高兹的答案是，真正的爱情存在于现实的相濡以沫中，爱人在所有的空间里盛开，经彼此而生，为彼此而生。

对D来说，非常幸运的是，高兹最终不仅在概念上确认了他们的爱情对自己人生的意义，并且有智慧在D身患重病时毅然承担自己的存在，承担两个人的现实存在。他决定六十岁退休、和D一起在乡间生活，他乐于去做饭做菜，找寻能够帮助D恢复体力的绿色食品。他专注于D的存在，正如D给了他一切，在剩下的日子里，他希望能给D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于是，在他们爱情故事结尾，我们看到，他们平静地把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从容地选择死亡，就像从容地面对对生之喜悦，共同奔赴另一个世界。

《致D》[法]安德里·高兹著，袁筱一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定价：20.00元



安德里·高兹

□苏笠

2007年9月的一天，法国左翼思想家安德烈·高兹与妻子多莉娜在巴黎郊区家中双双自杀身亡，高兹84岁，多莉娜83岁。此前一年，高兹生平最后的作品《致D》(D即多莉娜的简称)出版，这本薄薄的电子书把二人的爱情婚姻历程公之于众，也把思索与感动留给了世人。读完此书，我想他们所选的看似惊悚骇俗的结局，其实最自然不过，甚至，这才是人生最圆满、最幸福的结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在戏里听过这种宣誓，在高兹夫妇，这是现实中平静的选择。行动总是比誓言更需要勇气和智慧。其背后的故事也更耐人寻味。《致D》就是高兹夫妇爱情结局背后的故事。

《致D》在男人为中心心的女人表白而写的书信中，无疑是个异数。它既不是热恋期的炽热之作，也不是身处两地的相思之作，

D比高兹更清醒地知道，为了共同的世界，他们的爱情必须成为生活的契约，像所有世俗男女一样，他们也开始谈婚论嫁。爱情归